责编：龚克　E-mail:gongke@ccps.gov.cn　Tel:010—62806124　　2014年7月7日

新时期论坛

克服和纠正干部身上的官僚主义

——习近平平民风格的现实意义

□文　秀

官僚主义是党肌体上的毒瘤，它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疏远党群、干群关系，是“我们内部最可恶的敌人”。克服和纠正干部身上的官僚主义，最重要的就是要走到人民群众中去，与老百姓打成一片，就是要去掉“官腔”、脱掉“官服”、褪掉“官气”，还原本色、回归本真。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政坛和干部队伍中大力倡导新风，走平民路线、抒平民情怀、展平民风格，让广大老百姓感到“离自己很近、和自己很亲”，也为广大干部克服和纠正身上的官僚主义习气，立了标杆、作了示范。习总书记的平民风格，从他的工作作风、生活态度、兴趣爱好、人情交往甚至衣着穿戴中，都自然而然地流露了出来。

说“大白话”，入耳入心、直接地气。官僚主义者开口闭口说的是“官话”，大话、空话、套话连篇，常常说一大堆“正确的废话”，用当年毛泽东的话来说，是“官气熏天”。习总书记说的是“大白话”，他经常用一些普通群众听得进、记得住的话来表达思想，用“大白话”来讲大道理，充满浓郁的生活气息。比如：他用“鞋子合不合适，自己穿了才知道”，讲一个国家发展道路的选择；用“同样一桌饭，即使再丰盛，8个人吃和80个人吃、800个人吃是完全不一样的”，来阐明对中国发展现状的清醒认识；用“萝卜青菜各有所爱”比喻文明的多样性；用“碗与勺子难免相碰”来形容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他将青年时期价值观的养成比喻成“穿衣服扣扣子”，“如果第一粒扣子扣错了，剩余的扣子都会扣错，人生的扣子从一开始就要扣好”；他讲树典型不能用“开小灶”“吃偏饭”的方式来催生；他视察军营时说的“能打仗、打胜仗”这句实实在在的大白话，成了部队各项训练和军事演习“硬梆梆”的基本标准，等等。这样的“大白话”在习总书记的讲话中比比皆是。许多普通群众都说，“习总书记没有架子，他像咱老百姓一样说话，很亲切，像拉家常”。说大白话，就是说“平常人的话”“普通人的话”，讲的是“群众语言”，习总书记这些“大白话”，通俗易懂、简单明了、直白质朴，入耳入脑入心。

住“普通房”，严于律己、率先垂范。特权是特殊人与普通人的“分界线”，是“标签”和符号，特权最常见地表现为一种与地位和身份相匹配的享受。毛泽东在给官僚主义画像时就说：这些人“图享受，怕艰苦”；“一人做‘官’，全家享福”；“生活要求越来越高，房子越来越大，供应越多越好”，等等。习总书记反对特权享受，他在住的问题上从不讲究，总是放下身段，严于律己。他外出考察调研，经常住的就是普通房，从不提任何额外要求。2012年底，他到河北阜平考察时，住的就是县招待所的一个小套间，只有16平米大小，家具陈旧，卫生间瓷砖开裂。当地人员歉意地说，本来是可以安排在附近一家条件好一些的旅馆，他笑着说，这样就挺好，不必讲究。他还说：“小房子优越性很大，走两步上厕所，打电话都很方便。”他到河南兰考，也是住在焦裕禄干部学院一个普通的学员宿舍里，按照他的要求，不放鲜花、不摆水果，和其他宿舍并无二致。住“普通房”不只是一个简单的住宿问题，它折射出来的是一种平等意识和严以律己的精神。

吃“家常菜”，勤俭节约、反对浪费。大吃大喝、铺张挥霍，“吃”掉的是群众感情，“吃”掉的是干部形象，既为群众所反感，又成了一些干部生活腐化、滋生腐败和官僚主义的温床。提倡勤俭节约，反对“舌尖上”的浪费是习总书记平民风格的一个重要缩影。当年在正定县，他就总是在机关食堂与大家一起吃“大锅饭”，在生活上不搞特殊，上级来人，也是用正定的传统饭菜来招待，如扒糕、猪头肉、馄饨、缸炉烧饼、荞麦面饸饹，这就是他常说的“正定宴”。他常常提醒和告诫党员干部“少出去应酬，多回家吃饭”。特别是，他身体力行，到各地考察时，都吃简简单单的家常菜，食堂自助餐、大盘菜更是屡见不鲜。2012年12月，习总书记来到广州军区，在部队吃了两顿午饭，都是在士兵餐厅同战士们一道吃的自助餐。2012年12月，他在河北阜平县看望慰问困难群众，一顿晚餐，菜单只有4个热菜。他两次到兰考，也都是在焦裕禄干部学院职工餐厅用餐，每餐都是大锅饭菜。吃的几顿饭，从“内容”到“形式”，都跟老百姓在家吃的没有两样，基本上是有着浓郁“河南味”的烩面、胡辣汤、大烩菜。他还上庆丰包子铺品尝“平民美食”，二两大葱猪肉馅包子、一份炒肝和一份芥菜，成了大家传颂的“主席套餐”。

穿“平常衣”，轻松自然、朴素无华。穿衣不是小事，它既体现一个人的内在素质和涵养，体现一个人的精神面貌，也体现一个人的审美趣味、价值取向，更是一种无声的语言、无言的行动，释放出种种信号，给人以亲切、亲近感，能够让人轻松起来、放松下来。享乐型的官僚主义，穿名牌、提名包、戴名表，以此炫耀和标榜自己的与众不同，显示自己的身份和地位，不少人也就栽在了这上面。习总书记在衣着穿戴上经常展现出简约随意、朴素大方的风格，他在兰考考察期间穿的深蓝色外套，样式和质地都很普通。在个人着装上，他常常不墨守成规，不那么刻板，在考察调研甚至一些会议上也都全程不系领带，从造型上让人感受到了新的气象。特别是，他冒雨在武汉新港阳逻集装箱港区考察时，挽起裤腿、撑着雨伞、雨水打湿衬衫的场景，温暖了万千江城市民的心。今年3月，他在抵达荷兰的当晚，身穿改良版的中山装出席国王举行的盛大国宴，精干稳重、大气端庄，又轻松自然，让人耳目一新。

交“草根友”，眼睛向下、有情有义。交什么友，如何交友，从来都是每个领导干部需要慎重对待的大问题。现实中，有的眼睛向上，“摧眉折腰事权贵”；有的眼里只有“老板”，甚至“傍大款”，和“大款们”打得火热；有的和一些“小兄弟”吃吃喝喝、拉拉扯扯，搞“小圈子”“金兰结义”，“江湖味”十足，等等。和群众交朋友，和那些普普通通的人深交、久交，这是习总书记平民风格的又一重要特征。他指出：要坚决远离各种“小圈子”“小兄弟”，坚决杜绝低俗的投桃报李行为。他不忘有“一饭之恩”的农民朋友吕侯生，寄路费、花钱给他治病；他和“草根作家”贾大山的“神交”，情真意切、感人至深，深厚情谊是那么地纯粹，一个平凡的“草根作家”成了他的“好朋友、好兄长”；他在福建工作期间，还曾亲自下厨炒酸菜猪肉款待当年在梁家河当知青时的两位陕北汉子石治山和石春阳；他不忘师恩，每逢过年都会给老师送上问候和祝福；在福州时，他长期资助家庭困难的孩子读书，直到他们走上工作岗位；他调中央任职后，依旧与浙江下姜村的农民频繁书信往来，尽显一个领袖的平民情怀。交什么友、怎么交友，体现了一个人的立场与态度，反映出一个人内心深处的思想感情。

抒“真性情”，真切真挚、动容动人。无情未必真豪杰，伟人首先是个真人。说真话、道真情、做真人，实实在在、真真切切，敢于表达真情实感，爱憎分明。习总书记的“真性情”突出体现在他浓浓的亲情、友情、乡情和厚重的家国情上。他常念亲情友情，常抒家国情怀。在他的话语体系中，经常出现孩子、老人、家庭、生活，感情细腻而真挚。他与家人推着坐轮椅的父亲、与母亲牵手散步、早年骑着自行车载女儿等照片，温馨又温暖，流淌着柔情似水的孝与爱。他作为亲属参加纪念习仲勋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让人倍感亲切、倍受教育和倍加感动。他在福州任职时，夫妻两地分居，每天都会给妻子打个电话问候；出访时，他在飞机舷梯上为夫人撑伞、手挽着手走出舷梯，一幕幕“举案齐眉”的情景，动容动心动人。

晒“大众趣”，还原本色、回归本真。爱好折射出一个人的情操、品味和修养，也是一个人生活情趣的反映。习总书记在他的话语中，常常会谈及个人的兴趣爱好，以此与广大民众找到更多的“共同语言”、更多的“共同话题”，融入、融合、融洽。他曾谈到，自己爱好挺多，最大的爱好是读书。他说，“我经常能做到的是读书，读书已成了我的一种生活方式”；他还说，“我也是体育爱好者，喜欢游泳、爬山等运动，年轻时喜欢足球和排球”，自己也是一个足球迷；他还曾经表示，“有时间我看一些NBA比赛，甚至还看一点美国棒球赛”；他甚至会谈论流行音乐，说“歌手梁静茹在中国广为人知，被许多中国歌迷认为是中国人”。这些兴趣爱好带有浓郁生活气息，具有浓厚的大众色彩，都是普普通通人的喜好。习总书记与大众兴趣相投，进一步拉近了距离，还原了做人的本色与本真，传递出伟人首先也是个真人，是一个有着自己个人喜好的有血有肉、真真切切的人，打破了“不食人间烟火”的神秘感。习总书记这些平实的本真，让领导人的形象更加立体、饱满和生动、鲜活起来，更加可亲可爱，可以“触摸”。他积极健康的兴趣爱好，是一种导向、一种助力，在广大干部中会形成一种蓬勃向上的好风气。

走“亲民路”，同行同向、灵动善融。高高在上，脱离群众是官僚主义最典型的表现。不少领导干部喜欢躲在机关里，宅在高楼里，有的甚至怕群众、躲群众，有意无意地疏远群众，等等。群众说，领导干部不下来就是官僚主义，下来不办事就是形式主义。亲民乐民爱民，是习总书记平民风格中最显著的特征。无论在地方还是到中央，他都以最大努力与广大群众保持密切联系，尽最大可能与普通群众保持亲密接触。他喜欢深入到群众当中去，拉家常、问冷暖；喜欢融入到百姓当中去，与民相亲、与民同乐，在与民众的“零距离”交流中，听民声、解民意、知民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无论是庆丰包子铺里与市民一起排队就餐，还是南锣鼓巷与老街坊“拉家常”；无论是深圳莲花山公园与市民相伴而行，还是深圳罗湖区渔民村里与居民亲切交谈；无论是在甘肃兰州养老餐厅给老人端菜送饭，还是到河北阜平访贫时在炕上盘腿而坐、雪地上与乡亲搀扶而行，等等。用老百姓的话说，“总书记没有一点架子，到家里就跟走亲戚一样”。

习总书记的“吃穿住用行”特别是言与行，彰显“平民色”和“平民情”，展示“平民样”和“平民趣”，这不是个简单的姿态和形象问题，更是一种昭示和导向，表明作为人民公仆，就应该有这样一种立场、态度和感情。习总书记身上有浓厚的“平民情怀”，“这或许与他的经历有关”，因为“实际上他要比一般平民子弟更早地经受生活的磨砺”。他是以自己的努力，得到基层干部群众的信任、爱护与支持，也因此很早形成了他的平民情怀。然而，他身上凸显出来的这种平民风格说到底更是共产党人公仆情怀、公仆意识的表现，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体现，是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和群众路线的具体实践，所以，也是一种示范、一个标杆，是克服官僚主义的一面镜子和一部教材。这是习总书记平民风格的现实指导意义。

领导干部要心存敬畏

□张天峰

2010年9月，时任中央党校校长的习近平同志在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上强调：“领导干部工作上要大胆，用权上则要谨慎，常怀敬畏之心、戒惧之意，自觉接受纪律和法律的约束。”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又多次强调领导干部“要心存敬畏，手握戒尺”。敬畏是正确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心理基础。在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的新形势下，领导干部树立敬畏观念，对于抵制各种诱惑，克服“四风”侵蚀，始终保持良好形象是至关重要的。

为什么要在领导干部中倡导敬畏观念

倡导敬畏观念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在中国历史上，敬畏观念源远流长。传统儒家思想体现了对伦理道德的敬畏。南宋朱熹讲：“君子之心，常存敬畏。”明代方孝孺讲：“凡善怕者，必身有所正，言有所规，行有所止，偶有逾矩，亦不出大格。”敬畏观念传承不息，对于古代官员自律、慎独产生了重要作用。东汉杨震在赴任东莱太守途中，昌邑县令王密半夜前往送礼，被杨震拒绝。王密说：“暮夜无知者。”杨震回答：“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清代河南巡抚叶存仁在一次离职时，僚属们为避人耳目，特意在晚间设宴相送，并赠送了一批礼品。叶存仁当即赋诗一首：“明月清风夜半时，扁舟相送故迟迟。感君情重还君赠，不畏人知畏己知。”杨震所说的“天知、神知、我知、子知”和叶存仁所说的“不畏人知畏己知”，充分体现了古代一些官员对道德、权力的敬畏，对自律、慎独的追求，至今仍有警示和借鉴意义。

倡导敬畏观念是对党的优良传统的传承。在我们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的历程中，充分体现了无畏与敬畏的辩证统一。一方面，发扬大无畏革命精神，不畏强敌、不畏霸权、不畏艰难险阻；另一方面，以敬畏的态度对待规律、对待群众、对待历史、对待权力等，从而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一是敬畏规律。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迷信书本、不盲从权威，注重调查研究，形成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作风，充分体现了对客观规律的敬畏。二是敬畏群众。我们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确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形成了党的群众路线和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在实践中，在理论上我们党始终以公仆自居。延安时期，毛泽东曾经两次“挨骂”。1941年6月，延川县代县长李彩云不幸触雷电身亡，一位农民到处讲：“老天爷不开眼，响雷把县长劈死了，为什么不劈死毛泽东？”不久，清涧县农村有一农妇伍兰花因故大骂“毛泽东领导官僚横行”。当保卫部门要拘捕这两个农民时，毛泽东制止了，并从中深刻反思，采取一系列措施改进工作。正是因为我们党始终对群众心存敬畏，与群众同甘共苦、同心同德，形成了“只见公仆不见官”的良好局面，从而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拥护。三是敬畏历史。我们党高度重视以史为鉴，注重总结历史经验教训，避免重蹈覆辙。早在1929年，毛泽东就指出：“我们是唯物史观论者，凡事要从历史和环境两个方面考察才能得到真相。”1945年毛泽东和黄炎培关于“历史周期律”的著名对话，1949年毛泽东发出的“两个务必”号召和“我们决不当李自成”的宣示，都体现了对历史的敬畏。四是敬畏权力。邓小平指出：“共产党员谨小慎微不好，胆子太大了也不好。一怕党，二怕群众，三怕民主党派，总是好一些。”“我们拿到这个权以后，就要谨慎。不要以为有了权就好办事，有了权就可以为所欲为，那样就非弄坏事情不可。”这两段论述明确了在全国执政条件下，共产党人应有的敬畏观。在党的历史上，心存敬畏对于党的事业兴旺发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而遭遇挫折与失去敬畏不无关联，如“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文化大革命”和“破四旧”运动等等。由此观之，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倡导敬畏观念，有助于我们党更好地经受住长期执政的考验。

（下转第8版）

观察思考

重温经典

“巴黎手稿”的人性学说再定位

□聂锦芳

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对诸如外化、对象性与异化的区别、人化自然与自在自然的关系、人的存在方式以及“现实的人”的本质与实现等都做了较为深入讨论，这些主题被“巴黎手稿”提出、阐发或揭示出来了，是其不朽的贡献。

“巴黎手稿”中所阐发的马克思的异化观对其思想的后继者影响至巨。这一手稿中的“三个笔记本”于1932年发表以来引发了声势浩大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受到20世纪学者们普遍的关注，不论是赞同者还是质疑者都很重视这一文本。但彼此之间观点差别很大，甚至完全对立。这其中最关键的问题是：如何看待马克思思想与人道主义的关系，或者说“巴黎手稿”阐发的异化观是不是“抽象人本学”？时至今日，我们必须紧紧根据文本的实际内容及其论证逻辑，而不是从特定历史阶段生发的非此即彼的情绪来做出判断。我们分以下议题进行辨析。

自在自然和人化自然

在“巴黎手稿”中，马克思通过“对象性活动”的分析，阐明与人的实践活动相关联、由人的本质力量所创造并为社会的人所占有的对象世界，即“人化自然”的思想，以此来与“自在自然”相对照。

马克思认为，实践活动首先造成了自然界的分化，使自然界一分为二，一部分成为“人造物”，即“人化自然物”，一部分仍然是自然存在物，即“自在自然”。人造物、人化自然物、人化自然界属于人类世界的组成部分，这是由实践活动直接创造的。同时也表明，实践活动还是“人化自然”和“自在自然”相统一的基础，即通过实践活动，“自在自然”不断地转化为“人化自然”。劳动是人的类本质，其中包含有人与自然的关系。人把自然界作为劳动对象，劳动的根本内容是对象化，即劳动者把自己的本质力量凝聚和体现在作为劳动产品的自然对象身上，使自然界打上人的活动的印记，使人的有效的能力变为自然对象的属性。在这种关系中，劳动的对象化必然以自然界为前提。因为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就什么也不能创造。但是，异化劳动从人那里夺去了他们所创造的对象，从而使人同自己的类本质异化。只有扬弃异化才能有真正的人化的自然界，人才成为实现了自己类本质的人。

我们看到，马克思克服了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说成是精神的创造的唯心主义，又克服了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直接性，用社会的、实践的、发展的观点分析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从历史、现实和理想的角度看人化自然的生成过程，表述了一种姑且可以称之为“实践—人道主义”的思想。

人的存在：类、社会与个体

很多论者鉴于文本中的明确表述——诸如“人与人的类本质的异化”、共产主义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等等——认为“巴黎手稿”中的思想受到了费尔巴哈“人本学”的强烈影响，异化劳动学说打上了抽象人本主义深刻的烙印。然而，如果进一步检视做出这种判断的依据，就会发现，论者基本上都是从文本中寻章摘句、断章取义地抽象出一些命题而立论的。如果从总体上把握，就会发现，异化劳动学说不仅蕴涵着而且实现了对抽象“人本学”的超越。“巴黎手稿”中所讨论的人，不是超历史、超社会的人，而是现代社会中的“工人”“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异化劳动学说”中的“异化”不是抽象的哲学范畴，指的是现实生活中的四种具体的表现形式及其逻辑关系；劳动的异化不是超历史的普遍现象，其根源是在于现实的私有制社会；扬弃异化劳动的出路和途径不是理论的演绎和推导，而在于作为“私有财产积极的扬弃”的共产主义，在于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

这样，马克思关于人的存在方式，就至少可以分为三种形式：类存在、群体存在和个体存在。作为类的存在物，人具有区别于其他动物的“类特性”，即人的类存在或一般存在，这就是劳动、实践。作为群体的存在物，人与人之间必然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处于不同社会关系中的人具有不同的规定性，这就是人的群体特性，即社会关系。作为个体的存在物，人与人之间是千差万别的，有着各自内在的、特殊的规定性，这就是人的个体特质，它是由人的社会物质条件所决定的人的个性。人是类、群体和个体存在的有机结合。质言之，人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进行自由自觉的劳动的、具有各自独特个性的社会存在物。

“现实的人”：本质与现实

很多论者还认为，从“人的本质”的角度来思考问题，是马克思巴黎时期思想“不成熟”的表现，后来他放弃了这种思路，即完全从现实生活中理解人的存在；换言之，“成熟时期”的马克思认为，人并没有什么本质。但我认为，这里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相信、坚持还是放弃“人的本质”论，而在于对“什么是人的本质”的理解。从这个意义上讲，无论是巴黎时期还是之后，马克思都没有否认“人的本质”的存在，但他与抽象“人本学”和“人道主义”不同的地方在于，认为人的本质在于其社会性，即“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人的本质在于其社会性，意味着：其一，把人和动物区别开来的主要依据只能是人的社会生活，同时人类自身的区别——如古代人与现代人、资本家与工人的区别——也只能是人的社会生活，而不是人的自然的生理的特质。其实早在1843年马克思就已经有了这样的看法，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他指出：“‘特殊的人格’的本质不是它的胡子、它的血液、它的抽象的肉体，而是它的社会特质。”其二，人的本质是全部社会关系的总和，而不是社会关系的某一方面。社会关系的总和是在人的生产实践活动中形成的，适应于生产实践的需要，人们不仅结成了生产关系，而且形成了政治关系、思想关系和其他社会关系。要揭示人的本质，必须抓住人们在生产实践中所发生的必然联系，同时在这个基础上，把人放到各种社会关系中做综合的考察，才能真正把握人的本质。其三，人的本质具有具体性、历史性的特征。“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一规定，不仅表示它的客观性，而且表示着它的变动性、历史性，就是说它不是凝固不变的，而是发展变化的，社会是具体的、历史的，因此必须对人的社会关系做具体的历史考察。既然社会关系是变动的，那么作为社会关系的总和的人的本质也就不是抽象的固定不变的。总之，人的本质不能到现实生活之外去寻找，人的本质就存在于现实的、可感知的、发展变化着的社会关系之中；离开了人的实践活动，离开了社会关系的变化和发展，就抓不住人的本质，也就不能理解现实的人。